

# 吐蕃统治时期传入敦煌的中土图像

——以五台山图为例

赵晓星

莫高窟从中唐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佛教美术题材——五台山图。本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研究成果,详细考察敦煌石窟现存的中唐五台山图,并进一步确定图中画面的具体情节。此外,还整理了吐蕃统治时期第222窟、第159窟、第237窟、第361窟四处五台山图的特征与发展线索,并在此基础上,考察此时敦煌五台山图的粉本来源与传入路线,以及五台山信仰中的密教性质,最后对中唐以后敦煌五台山图的情况作简要梳理。

## 一、五台山信仰的兴起与五台山图的绘制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密教研究”(编号:09XZJ005)和2008年度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密教研究”阶段性成果

五台山,属太行山脉的一支,位于今山西省东北部五台和繁峙两县境内,周围五百余里。五台山被佛教徒认为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是与普陀、峨眉、九华并称为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早在西晋永嘉三年(309),雁门郡百余家避乱山中,遂居其地。有人远远望见山中的居舍,却找不到相通的途径,因此传说五台山为“仙者之都”。到了北齐时期,五台山佛教兴盛,山中已有二百伽蓝<sup>①</sup>。《华严经》载:“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彼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有一万菩萨眷属,常为说法。”<sup>②</sup>真正确定文殊菩萨的道场清凉山为中国之五台山,应是到了唐代。唐菩提流志译《佛说文殊师利法华藏陀罗尼经》中说:“于此赡部洲东北方,有国名大振那。其国中有山号曰五顶,文殊师利童子游行居住,为诸众生于中说法。及有无量诸天龙神夜叉罗刹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围绕供养恭敬。”<sup>③</sup>“振那”是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有山号曰五顶”也就渐渐被附会成五台山了。认定五台山为“清凉山”的应属华严宗大师法藏与澄观,法藏在《华严经探玄记》中明确指出“清凉山则是代州五台山是也”<sup>④</sup>,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疏》中又说“清凉山,即代州雁门郡五台山也”<sup>⑤</sup>,同时代的窥基在《妙法莲华经玄赞》中也称“曼殊室利云妙吉祥……华严经说在此清凉五台山”<sup>⑥</sup>。

五台山信仰随着文殊信仰的兴起而兴起,并得到唐代多位佛教大师的推崇,密宗大师不空与华严宗大师澄观是最主要的倡导者,净土宗大师法照也起了推动作用。正是他们将文殊与五台山信仰推向了高峰,并对唐朝及周边地区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以致五台山信仰在后来的五代、辽、宋、夏、金都有体现,并传到了日本和朝鲜,时值今日仍成为佛教中重要的信仰对象。巡礼、朝贡五台山自不必说,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大量的“五台山赞”、“五台山曲子”,为了满足更多信众的要求,绘制相关图像就成为迫切而实际的需求,“五台山图”应运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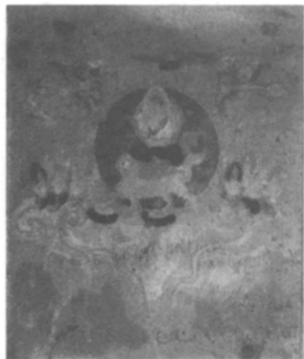
唐龙朔年间(661—663),西京会昌寺沙门会曺共内侍掌扇张行弘奉诏检行五台山圣迹,同行的还有五台县吕玄览画师张公荣等十余人。这些人幸运地在五台山遇到了神异化现的祥瑞,并奏闻皇帝,使五台山圣迹得到了官方认可。同时,还绘制了五台山图与小帐,并作略传一卷,广行三辅。这是最早记录的五台山图的绘制情况,此后五台山图流传开来,在太原有专门以绘制五台山图为业的画师。日僧圆仁在巡礼五台山时,就得到了五台山化现图一幅,并携回日本。

五台山图传入敦煌,出现在敦煌壁画中,已经到了中唐,也就是吐蕃占领敦煌时期(781—848)。有关敦煌五台山图的研究,历来被学者重视,宿白《敦煌莫高窟中的“五台山图”》<sup>⑦</sup>、小山满《敦煌第六十一窟〈五台山图〉研究》<sup>⑧</sup>、王进玉《敦煌壁画中的〈五台山图〉》、《敦煌文物中的五台山资料》<sup>⑨</sup>、孙修身《莫高窟佛教史迹画内容考释(八)》<sup>⑩</sup>、杜斗城《敦煌所见〈五台山图〉与〈五台山赞〉(摘要)》、《敦煌石窟中的五台山史料》<sup>⑪</sup>、赵声良《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研究》<sup>⑫</sup>、张惠明《关于圣彼得堡和巴黎分藏的两幅五台山文殊图》、《敦煌〈五台山化现图〉早期底本的图像及其来源》<sup>⑬</sup>、孙晓岗《文殊菩萨图像学研究》<sup>⑭</sup>,都是重要的成果。以上研究已经涉及到敦煌现存所有的五台山图,但笔者以为,对中唐五台山图的发展演变,诸位前辈因条件所限,论述还不够详细周全,故在此不揣冒昧,也来谈一谈吐蕃时期敦煌五台山图的发展演变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 二、吐蕃时期敦煌的四处五台山图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壁画中保存至今的有四处五台山图,分别位于莫高窟第222、159、237和361窟。有关五台山的文献记载非常丰富,考虑到这四处五台山图均为中唐时期所绘,而五台山的地理记录因各时代的不同而有一定变动,因此在考释其图像内容时以唐代文献为主,即以唐代慧祥《古清凉传》、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sup>⑮</sup>为主,以宋代《广清凉传》<sup>⑯</sup>、《续清凉传》<sup>⑰</sup>、敦煌五台山文献<sup>⑱</sup>、明《清凉山志》<sup>⑲</sup>和新中国《五台山志》<sup>⑳</sup>等资料为补充。

莫高窟第222窟为吐蕃统治早期新开凿的小型洞窟<sup>㉑</sup>,敦煌最早的一例五台山图就位于此窟。这幅五台山图被分置于主室西壁佛龕外南、北两侧的上部,其中南侧为文殊与万菩萨显现,北侧为五台山胜迹与光中神异化现。南侧图像,最上部为山岳背景,下为两只相对而飞的灵鸟,从下部的山峦中升起三朵祥云。中间的祥云托起脚踏莲花的狮子,文殊菩萨盘右腿、垂左腿坐于狮背的莲花之上,两侧的祥云分别托起五位菩萨,均胡跪双手合十礼拜文殊。在这幅图中,骑狮文殊、众菩萨和灵鸟是三个主要因素。《华严经》中称文殊与万菩萨常于清凉山说法,五台山文殊菩萨乘狮与万菩萨化现的事迹在清凉三传中记录颇多。五台山文殊显圣还被赋予了政治含义,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唐穆宗即位,二月河东节度使裴度奏报:“今月四日五台山佛光寺侧庆云现中有金人乘狻猊,颌徒千万如金仙状,自巳至申方灭。”<sup>㉒</sup>相对而飞的灵鸟为“吉祥鸟”,此鸟常现于五台山,如敦煌文献S.5573就有“吉祥圣鸟时时现”、“四山多饶吉祥鸟”之语。吉祥鸟的出现主要有接引之意,如《广清凉传》“无著和尚入化般若寺十三”条载“有



莫高窟第222窟主室西壁龕外南側上部五台山 中唐 乔兆福摄影



莫高窟第222窟主室西壁龕外北側上部五台山(局部) 中唐 乔兆福摄影



莫高窟第159窟主室西壁龕外北側下部(南側屏風)五台山 中唐 乔兆福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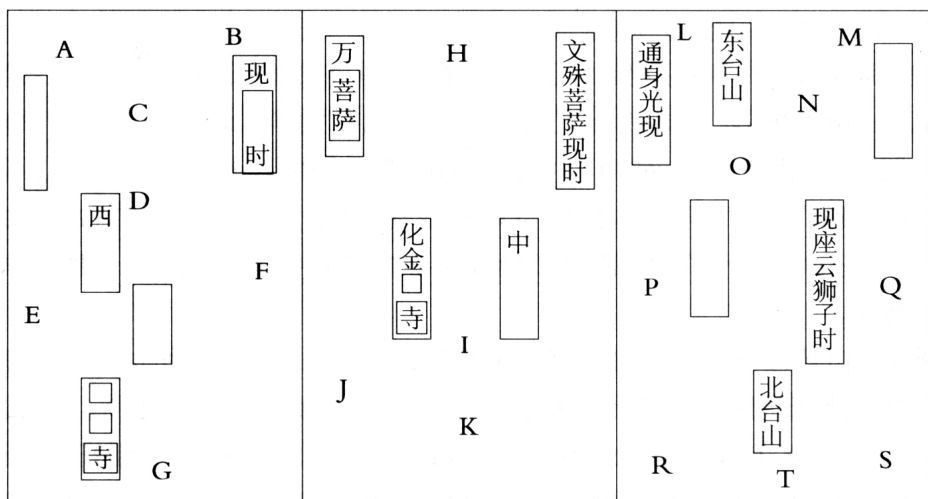
二吉祥鸟,当无著顶上,徘徊飞翔”<sup>②</sup>。

此窟北側五台山图像,上部为神异化现,下部为五台山的真实图景。画面上部是从山峦中升起三朵祥云,从北向南依次托起光中菩萨、光中佛手和光中居士。下部为山峦前有一草庵,庵前有河水流过,对岸一人模糊,一虎向此人走去,另有一人双手合十向北礼拜。在这部分图像中,主要的构图要素有两个,一是光中化现,二是五台山传说。于佛光中化现各种神异是五台山的一大特色。《广清凉传》载中台北、北台南云中化现“有梵志婆罗门像。如睹菩萨及圆光者,白衣即得初果及第二果”<sup>③</sup>,长安二年(702)“僧俗一千余人,同见五色云中,现佛手相……复见菩萨,身带璎珞,西峰出现”<sup>④</sup>。图中的这些神异都居于佛光之中,佛光在五台山出现频繁,《古清凉传》载隋解脱禅师依五台山,“并作佛光等观”<sup>⑤</sup>,佛光观成为佛教的一种修行方法。图像下半部所表现的五台山传说,孙晓岗考证这一情节为释普明遇虎故事<sup>⑥</sup>。这一画面过于简略,没有相应的榜题进行说明,所以在具体情节的确认上有相当难度。笔者以为,此处可能为《广清凉传》所载中台北趾及台领南吴摩、葱兰二寺,“时威仪动物,群虎如犬驯扰”<sup>⑦</sup>。释普明遇虎之事发生在五台山之南台,而“群虎如犬驯扰”位于中台,更具代表性,又可标志五台山最中心的中台。

莫高窟第159窟为中唐晚期前段洞窟,始建于公元9世纪初至839年左右。此窟的五台山图位于主室龕外北側文殊变下方,为两幅并列的屏风画。画面大体上可分为两部分,即上部的光中化现部分与下部的五台山胜迹部分;从构图上又可细分为三部分,上部为化现,中部为中台并二台胜迹,下部为二台胜迹。南侧屏风,上部由祥云托起四个化现图像,中间两个为光中现菩萨头,两侧分别为光中现居士,居士为着唐装的男子形象,均胡跪双手合十向中礼拜。中部为以中台为中心的三个山头,应是表现五台中之三台。中台上有一座大型的寺院建筑,寺院前有一比丘禅坐,一虎卧于侧,周围为朝礼的僧俗等人。中部与下部画面由两座小桥连接。下部两个突出的山头应为五台山的两台,共有四组小画面,从南向北依次为比丘与白衣人对话、比丘与居士礼拜寺院、二居士拜塔、寺院前比丘禅坐居士礼拜。北侧屏风上部从南向北依次为光中化现居士、文殊菩萨乘狮化现、光中现佛手。其中文殊菩萨为结跏趺坐,与第222窟不同。中部图像仍为三台,中台上有一座塔,僧俗人等正巡礼参拜。下部为两台,南侧一台下有寺院一所,北侧一台旁也有一寺院,一男性居士于其前双手合十礼拜。

佛塔是第159窟五台山图新增加的内容,五台山上此类胜迹非常多,《古清凉传》载中台上有小石塔数十枚,并有阿育王古塔<sup>⑧</sup>。南侧屏风右下角“比丘与白衣人”对话的画面值得注意,文殊菩萨于五台山常常化现出各种形象点拨世人,在唐代最为著名的莫过于佛陀波利遇文殊化现的白衣老人了。莫高窟盛唐第217窟南壁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中就画了这一情节,同类画面在莫高窟第61窟五代的五台山图中也出现了,因此笔者认为此处白衣人与比丘对话的画面可能是文殊化现老人与佛陀波利见面的情节。这个故事在《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佛祖统纪》、《宋高僧传》、《广清凉传》等多种文献中都有记载,主要讲佛陀波利巡礼五台山,遇到文殊化现的老人向其询问《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之事。第159窟的这一画面与后来的佛陀波利遇文殊老人的画面非常相似,但无相关题记,所以还不能确定。

莫高窟第237窟同样为中唐晚期前段洞窟,始建于公元9世纪初至839年左右,五台山图位于此窟龕外北側文殊变下部,为并列的三幅屏风画。第237窟的五台山图虽被分成三个屏风,但除去屏风边缘之后,可拼合成一幅完整的五台俱全的五台山图。第237窟有数条榜题用来标志五台山的各种胜迹,这是敦煌出现的第一幅带有题记的五台山图,具体情况如下图,其中长方形框为题记,A—T为细部图像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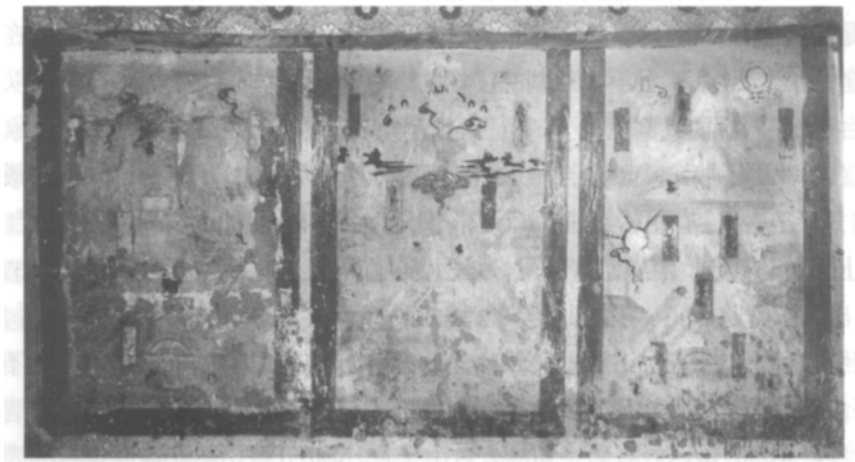
莫高窟第 237 窟五台山图示意图(南→北) 赵晓星绘

南側屏風, A 為光中化現居士, B 為佛光(旁書榜題為“現……時”), C 為兩人禮拜, D 為一座寺院, E 為兩人禮拜一方形台座, F 為一人趕牛, G 為兩人禮拜一座大寺院(寺院旁榜題模糊, 為“□ □ 寺”)。中間屏風, H 為騎獅文殊(旁有榜題書“文殊菩薩現時”)與萬菩薩化現(旁有榜題“萬菩薩”), I 為一座寺院, 寺前四人分列兩旁相對禮拜, J 為兩人站立雙手合十禮拜, K 為一座大寺院, 寺前二比丘于席上對談。北側屏風, L 為佛光中一佛手(但榜題書“通身光現”), M 為光中化現一人, N 為一座小寺院, O 為兩人禮拜一座寺院, P 為圓光化現, Q 為雲端一獅子(旁書榜題“現座云獅子時”), R、S 分別為兩人對談(疑為佛陀波利遇文殊老人), T 為一座大寺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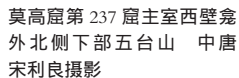
在这幅五台山图中,除了添加榜题来标示画面情节之外,新增加了赶牛朝贡五台山的细节。五台山自古以来,送供者络绎不绝。《广清凉传》载“隋开皇十一年,文帝敕忻州刺史崔震,持供于五台顶”<sup>③</sup>。唐长安二年(702)“遣内侍黄门金守珍,就山供养。显庆设斋,乃供一万菩萨是日。忻代诸处,巡礼僧数,盈一万。皆云:万圣赴会。普施一镒钱、一万缗,别施菩萨。内侍与州县,具达朝廷。由斯灵瑞,台山复兴”<sup>④</sup>。因此,赶牛画面的加入实际上代表了向五台山送供的相关事件。



莫高窟第 159 窟主室西龕外  
北側下部(北側屏風)五台山  
中唐 乔兆福摄影



莫高窟第361窟属吐蕃统治敦煌晚期后段洞窟,开凿于9世纪40年代,保存着中唐时期敦煌最晚的一幅五台山图。主室西壁盪顶帐形龕内北侧帐扉顶画圆盖飞天图案,西、北壁屏风二扇,画文殊显现与五台山。有关这幅五台山图,笔者在《莫高窟第361窟的五台山图——莫高窟第361窟研究之二》<sup>②</sup>一文中有详细的考证。此图的特征是西、北两壁的屏风可以拼合成一幅完整的五台山图,拼合后的图像上部为骑狮文殊与万菩萨化现,下部为有榜题标记的五台山诸







莫高窟第361窟五台山线描图 赵晓星绘

台,及台上化现诸种神异与胜迹。

西壁屏风中台顶的寺院以榜题标示为“竹林寺”《广清凉传》记中台“今益唐来寺”条,即唐代在五台山中新修寺院,其中就有“竹林寺”。同书载有“法照和尚入化竹林寺”<sup>③</sup>的故事,大意是讲法照和尚在大历二年(767)于钵中见五台山,并见山中有“大圣竹林之寺”,后来法照果然在五台山见到了化寺“大圣竹林之寺”与文殊、普贤二圣。后至大历十二年(777)法照再次见到神变,于是在中台中麓下,依据所见的大圣化寺的样式,特建一寺,仍以竹林题号,这就是后来的竹林寺。

北壁中台山腰的一座建筑旁榜题书“普通院”,这是五台山图中新增的内容。《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多处提到普通院,其中五台山多处设置此院:“时人称之为上房普通院。长有饭粥。不论僧俗,来集便僧宿,有饭即与,无饭不与。不妨僧俗赴宿,故曰普通院。”注释曰:“普通院,‘普通’之‘普’是‘普遍地(不分僧俗)供养’之意;‘通’是‘通至 交通 通路上’之意。普通院,是寺院为朝山者在朝山路线上设立的招待站,凡参拜朝圣的僧俗人等均可住宿。圆仁所记普通院二十一处,以五台山为中心,分东、南两路……大体上以半日行程为间隔立一院。”<sup>④</sup>

西、北壁屏风还各有一处佛陀波利与文殊老人相遇的画面,北壁屏风还存有榜题“文殊师利共西国佛□□利相见时”。故此处应为佛陀波利再访五台山,再次见到文殊菩萨化现的老人,并隐于金刚窟之事。《广清凉传》载:“波利持本,再至五台山,相传入金刚窟,于今不出。”<sup>⑤</sup>莫高窟第61窟西壁五台山图亦有此画面,榜题为“佛陀波利见文殊化老人身问西国之梵”。所以,这两处僧人与老人交谈的画面可以确定为佛陀波利见文殊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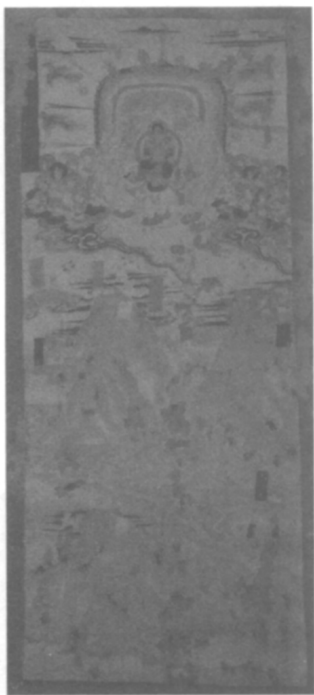
以上是中唐时期敦煌壁画中出现的四处五台山图的基本情况,经过对这些五台山图所描绘情节的具体考证,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五台山图在中唐时期发展演变的线索,即从最初的简单稚拙的第222窟,经过第159、237窟,最后发展成较为完备成熟的第361窟五台山图。

### 三、吐蕃时期敦煌五台山图的特征与性质

以上四处五台山图的特征主要集中表现在对五台的表现与构图要素的增减变化两个方面。既然是要表现五台山,那么其本身的地理特点即“五台”就是必须绘制的内容。在最早的一幅第222窟五台山图中,既看不到绘制的图像的五台,也没有榜题进行标示,而是以草庵和老虎,即中台寺院“群虎如犬驯扰”这一特征来表示中台,并以五台山上种种化现形象来烘托此处即为五台山。到了第159窟的五台山图中,五台分别在每屏中以中部三台(中台最大)、下部两台的方式绘出,但没有用榜题进行标示,只能确定最中心为中台、四台环绕中台的基本特征。实际上,两幅屏风画中各有五台,更像是两幅从不同角度绘制的五台山图。第237窟的五台山图最早出现了榜题,其中“东台山”与“北台山”两条保存至今仍非常清晰,三屏拼合之后,可见四台围绕中台的完整五台山图景。第361窟的五台山图对五台的表现最为充分,不仅在图像上几乎平均地分配了五座山头,更是完整地保存了其中四台的榜题,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台居中,西、北、东、南四台各居一角的五台山全景,至此五台山图在地理地貌的表现上已基本完备。

从整体上看,四处五台山图的构图要素基本上呈从少到多的发展态势,具体情况如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四处五台山图中的构图要素虽然是由少到多,但并非在原图的基础上逐渐增加新情节绘制,而是每一幅在具体细节的选择上都相对独立。其中,出入最大的为五台山神异化现部分,第222、159、237窟的化现部分较为相似,可视作逐步增加的过程,但到了第



莫高窟第361窟主室西壁龕内北側屏風画(西壁)五台山 中唐 宋利良摄影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五台山图构图要素调查表



莫高窟第361窟主室西壁龕内北侧屏风画(北壁)五台山中唐 宋利良摄影

窟号	文殊	万菩萨	吉祥鸟	典故		胜迹			朝拜者			化现							
				虎	佛陀波利遇文殊老人	草庵	佛塔	寺院	居士	比丘	赶畜者	光中菩萨	光中佛手	通身光	光中居士	狮子	化金桥	瑞兽	佛头
222	√	√	√	√		√			√			√		√	√				
159	√			√	√ ?		√	√	√	√			√	√		√			
237	√	√	√		√ ?		台座	√	√	√	√			√	√	√	√		
361	√	√	√	√	√		√	√	√	√	√				√		√	√	√

361窟则完全不同。第361窟除了延续原来化现部分旧有的“通身光”之外,“圣金桥”、“圣瑞兽”与“圣佛头”均为全新的内容,而旧有的“光中佛手”、“光中居士”则没有绘制。

在胜迹部分,第222窟仅画了草庵一所,后面三窟再未出现;第159窟多绘塔寺,但未书写榜题;第237窟在寺院旁加上榜题,可识读者仅有几乎无法辨认的“□□寺”、“化金□围”;第361窟全图共有十二座寺院,其中榜题可辨识者有“竹林寺”、“万像寺”、“宝塔寺”三条,增加了“普通院”这种新的佛教建筑设施。

在朝拜者当中,从最初的一、两人,人数渐渐增多,其中不仅有朝山的居士,更有益于山中修行的比丘,而送贡者也由第237窟的一人赶牛发展成了第361窟的多人赶畜的送贡队伍。佛陀波利遇文殊老人的典故,是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传布一起盛行于唐代的,在第159窟已隐约可以看到这种比丘与老舍对谈的图像,第237窟这种画面也出现了两次但因其太过模糊无法确认,最终在第361窟借助榜题固定下来。

这四处五台山图的性质,正如张惠明在《敦煌〈五台山化现图〉早期底本的图像及其来源》一文中指出的,这些五台山图均属于“五台山化现图”之类。张文中提到的正定开元寺三门石刻录的《五台山化现图》,为唐乾元元年至大历十二年间(758—777)的作品,其基本样式是:“有五个台,以中台作为全图的中心,其余四个台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分布于中台四周,图上左右分绘化现图像。”<sup>③</sup>这种五台山化现图的基本样式与莫高窟第237、361窟一致,所不同的是,正定开元寺的五台山图中的四台是围绕中台按上、下、左、右分布的,而第237、361窟则是四台围绕中台分布于四角。之所以称其为“五台山化现图”,大概是因为这些五台山图绘制的主要目的不是作为地图使用的,而是为了展现五台山上化现的各种神异,供信徒供养礼拜之用。根据笔者对第361窟五台山图的考察发现,第361窟图中的一些寺院胜迹与五台山的实际地理位置并不相符,所以其无法作为地图使用的特点非常明确,彰显文殊与五台山的神异胜迹才是这些五台山图的主题。

莫高窟这四处五台山图出现的位置,均位于洞窟主室的西壁,其中第222窟位于西壁龕外南北两侧上部,第159、237窟位于西壁龕外北侧文殊变下方,第361窟位于西壁龕内北侧。这些洞窟均为坐西朝东,西壁为正壁,五台山图均位于西壁足以说明这一信仰的重要性。与后来作为文殊变背景出现的五台山图像不同的是,这四处五台山图均带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也是其区别于后来五台山背景的特性。特别是第222窟的五台山图,位置最为特殊,其下绘制的是毗沙门天王,而几乎与五台山完全无涉,因此这幅五台山图的独立性最强。第159、237两窟的五台山屏风画上部均为文殊变图像,因此这些五台山图应是附属于其上的文殊变的,是为了补充说明文殊菩萨道场而绘制的。第361窟龕内塑像已失,原来可能也是作为文殊菩萨彩塑的背

景绘制的,但其完备成熟的程度已脱离了作为背景山水的约束,而带有相当的独立性。

#### 四、吐蕃时期敦煌五台山图的粉本来源

敦煌五台山图为什么最早出现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这些五台山图的粉本来源如何,这就不得不考察吐蕃本土、敦煌与唐朝内地三地之间在这一时期的交流。这一时段,吐蕃与唐朝在佛教方面,有过多次重要交往。建中二年(781),吐蕃遣使来求沙门善讲佛理者,德宗命沙门良琇、文素往说法教,岁一更之<sup>③</sup>。长庆二年(822),唐及吐蕃会盟,立碑而还,“盟毕,于佛前作礼,使僧讽文以为誓约”<sup>④</sup>。长庆四年(824),吐蕃遣使请五台山图<sup>⑤</sup>。《册府元龟》对此记载稍详:“穆宗长庆四年九月甲子,灵武节度使李进诚奏,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山在代州,多浮图之迹,西戎尚此教,故来求之。”<sup>⑥</sup>吐蕃人信仰五台山,有据可查,《拔协》中记载在赤德祖赞时,“为了将来重修佛寺,五位使臣便到五台山圣文殊菩萨的佛殿去求取图样”<sup>⑦</sup>。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吐蕃治下的敦煌出现了五台山图。

莫高窟这四处吐蕃时期的五台山图传入敦煌的路线可能并不相同,其由简至繁的发展过程也许不是在敦煌一地完成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第361窟的五台山图与前三处的五台山图有很大的差别。前已提及,这种差别一方面体现在化现部分,第361窟仅保存了原来的“通身光”,而“圣金桥”、“圣瑞兽”与“圣佛头”都是新增内容。更重要是,第361窟的榜题书写习惯与第237窟和后来的第61窟有很大差别。从第361窟现存榜题所书文字的语言习惯来看,“圣金桥”、“圣瑞兽”、“圣佛焰”、“圣佛头”,这些榜题第一个字均为“圣”字。吐蕃佛教和密教经典用语,习惯在神圣的人或物前加一“圣”字。唐玄奘所译的《佛说六门陀罗尼经》,古藏文汉译名为《圣六门陀罗尼》(敦煌古藏文写卷P.T.415号),于经名最前加一“圣”字,此类例子,在吐蕃佛经中不胜枚举。从语言习惯来看,这几条榜题很可能是根据吐蕃语译来的汉语,特别是“圣佛焰”一语,各种五台山图中均称“通身光”,可见其可能非汉本,而是来自吐蕃。所以,笔者怀疑第222、159、237三窟的五台山图属于从中原传入的五台山化现图,而第361窟五台山图则很可能是先传入吐蕃本土,经过吐蕃改造再传入敦煌的。

在这个传入过程中,五台山信仰的密教性质需特别注意。五台山信仰的兴起,最早得益于唐代密宗大师不空的倡导,不空曾任命弟子含光在五台山住持并修建金阁寺。不空于唐永泰二年(766)上奏表,在五台山创建金阁寺。《旧唐书》载:“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亿万。”<sup>⑧</sup>大历二年(767),不空又奏请在五台山金阁寺等五座大寺院设国家道场。正如孙晓岗指出:“可以说从大历年间开始,五台山佛教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在密教势力范围下,全山的佛教都在密教的统一之中。”<sup>⑨</sup>莫高窟第222、159、237三窟属显教洞窟,其五台山图也未显示出密教特征,而第361窟为吐蕃统治后期典型的密教洞窟,其五台山图有一定的密教内容。第361窟的五台山图画面虽小,但特别突出佛陀波利遇文殊老人的情节,并配以全图最大一块榜题来进行说明。佛陀波利遇文殊老人的传说,讲述的是密教经典《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传入中国的过程,对这一细节的突出带有密教性质。此外,前已提及,榜题上突出“圣”字,也与密教用语的习惯有关。五台山信仰传入吐蕃后,受到吐蕃僧俗的重视,赤松德赞为莲花生大师修建的住所中的佛堂也是照汉地五台山寺庙的图样建造的<sup>⑩</sup>。而五台山信仰与五台山图也融入了后来藏传佛教的信仰当中,至今仍流传有五台山图唐卡,成为藏传密宗重要的信仰对象。



## 五、吐蕃时期敦煌五台山图对后期五台山图的影响

五台山图作为吐蕃时期传入敦煌的佛教美术新题材,对后来敦煌壁画五台山图像有着重要的影响。莫高窟晚唐第9窟的五台山图位于主室中心柱龕内南壁,由三幅屏风画组成。由于前有彩塑遮挡,无法考察其全貌。就现在所见,应是继承了中唐晚期五台山屏风画的构图与布局,很可能也可以拼合成一幅完整的五台山图。从现在可见的细节来看,这幅五台山图较之中唐又有所发展,如新增加的于山之处供奉佛经和现“金翅鸟王”等画面。第9窟的五台山图也是敦煌最后一处以独立屏风画形式出现的五台山图,此后的五台山图像(除第61窟)均作为背景融入到文殊变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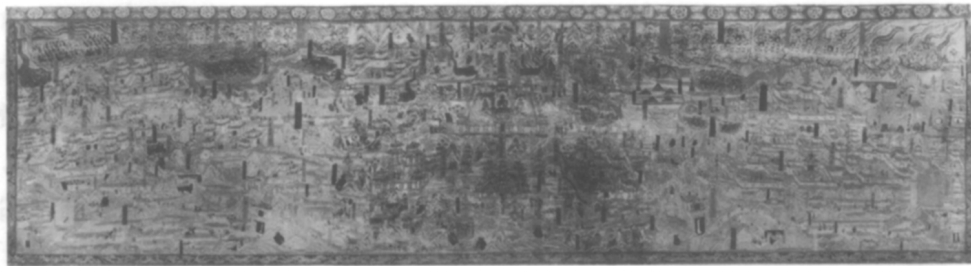
莫高窟第144窟,据樊锦诗、赵青兰《吐蕃占领时期莫高窟洞窟的分期研究》属吐蕃统治敦煌晚期前段洞窟,开凿时间大约为公元9世纪初至839年左右。但不少学者也将此窟列入晚唐时期,如《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sup>⑤</sup>、赵声良、王进玉等关于五台山研究的文章中都将第144窟五台山图归入晚唐时期。从实地考察的情况来看,这一洞窟的营建很可能处于中、晚唐交接之际,此窟的五台山图像不属于独立的五台山图,只是作为文殊变的背景出现。也就是说,第144窟的五台山图像是作为文殊变或文殊赴会图的一部分传入的,虽然其中也描绘了五台山,但五台山只起到衬托作用,不属于五台山化现图之列。这种以五台山为背景的文殊变在后代多有延续,如榆林窟五代第32窟的五台山图像,较之莫高窟第144窟,绘画情节更多,并保存多种胜迹的榜题。这种形式在敦煌绢画中也有表现,法国吉美美术馆藏北宋敦煌绢画EO.3588《五台山文殊菩萨化现图》就是这种形式。

莫高窟五代第61窟西壁的五台山图是通壁的巨制,是敦煌石窟中所有五台山图中面积最大、情节最多、画面最丰富的一幅。对这幅五台山图,赵声良有详细考证与论述,这也是学界关注最多的一幅五台山图。整个画面分三层:下层表现五台山区内的城池县镇和名胜古迹与当时的社会宗教活动,如河北正定县、忻州定襄县、五台县、石岭关镇、永昌之县等五处,各种店铺、住宿、养马等旅店十一处,行旅队伍中有数起送贡使。中层,表现神人交往的宗教世界活动,有大量寺院、楼阁兰若、茅庵塔庙,有修行的和尚,有佛像,有善男信女,也有天空神变。上层主要表现想象的天空幻化神变,共三十多种,如雷电云中现、佛手云中现、灵鸟现、功德天女现、金色世界现、大毒龙二百五十等。在这幅画中,五台山信仰开始融入浓浓的世俗味道,各种世俗生活的小景零散地分布于五台山的各个角落。这幅五台山图的性质更为特殊,单从画面来看,是一幅独立的五台山图,但结合洞窟主尊原为骑狮文殊像来看,这幅巨型壁画又是作为文殊并眷属的背景出现的。

与这幅巨型五台山图比较,莫高窟吐蕃晚期所绘制的五台山图,特别是第361窟的五台山图的基本要素已经非常齐备,如对五台、天空神变、著名的佛教寺院、佛陀波利遇文殊老人、送贡者等等的表现都已具备。最大的不同,就是第61窟的文殊菩萨跃出了吐蕃时期的主室龕内



莫高窟第144窟主室龕外南侧文殊变 中晚唐 宋利良摄影



莫高窟第61窟主室西壁五台山 五代 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提供



的一侧,跃上了主室的中心佛坛,成为众人顶礼膜拜的主尊。这一点,也代表了文殊信仰在五代的敦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综上所述,中唐敦煌的五台山图代表了吐蕃时期从中土传入的新的佛教美术题材。通过对四处五台山图的分析,其传入的路线与方式很值得考察,很可能一部分由中原直接传入,而另一部分从中原经过吐蕃改造再传入敦煌。中唐时期的这四处五台山图虽然在时间上从早到晚,但绘画风格统一,特别是同属中唐晚期的三处屏风画,内容不尽相同,但风格如出一辙。这些五台山图,在中唐时期经过了一个由简到繁、由稚拙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不仅对后来五台山图的绘制产生了重要影响,更为我们保存了难得的早期五台山图的样本。

- ①②⑨ 慧祥:《古清凉传》卷上,《大正藏》第51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4年,第1094页,第1095页,第1094页。
- ② 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二九,《大正藏》第9册,第590页。
- ③ 菩提流志译:《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大正藏》第20册,第791页。
- ④ 法藏:《华严经探玄记》卷十五,《大正藏》第35册,第391页。
- ⑤ 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卷四七,《大正藏》第35册,第859页。
- ⑥ 窥基:《妙法莲华经玄赞》卷二,《大正藏》第34册,第674页。
- ⑦ 宿白:《敦煌莫高窟中的“五台山图”》,载《文物》1951年第2卷第5期。
- ⑧ 小山满:《敦煌第六十一窟〈五台山图〉研究》,袁林译,载《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1期。
- ⑨ 王进玉:《敦煌壁画中的〈五台山图〉》,载《五台山研究》1987年第1期;《敦煌文物中的五台山资料》,载《五台山研究》1991年第3期。
- ⑩ 孙修身:《莫高窟佛教史迹画内容考释(八)》,载《敦煌研究》1988年第1期。
- ⑪ 杜斗城:《敦煌所见〈五台山图〉与〈五台山赞〉(摘要)》,载《敦煌研究》1988年第2期;《敦煌石窟中的五台山史料》,载《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 ⑫ 赵声良:《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研究》,载《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
- ⑬⑭ 张惠明:《关于圣彼得堡和巴黎分藏的两幅五台山文殊图》,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会议文集未收);《敦煌〈五台山化现图〉早期底本的图像及其来源》,载《敦煌研究》2000年第4期。
- ⑮⑯⑰ 孙晓岗:《文殊菩萨图像学研究》,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84—89页,第86—87页,第101页。
- ⑱⑲ 参见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校注,周一良审阅:《〈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 延一:《古清凉传》,《大正藏》第51册,第1101—1127页,第1112页,第1106页,第1107页,第1108页,第1105页,第1106页,第1114—1115页,第1111页。
- ㉞ 张商英:《续清凉传》,《大正藏》第51册,第1127—1135页。
- ㉟ 杜斗城:《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㊱ 释镇澄:《清凉山志》,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版。
- ㊲ 侯文正:《五台山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 ㊳ 本文洞窟时代根据樊锦诗、赵青兰《吐蕃占领时期莫高窟洞窟的分期研究》,载《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
- ㊴㊵㊶㊷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80页,第11532—11533页,第11724页。
- ㊸ 赵晓星:《莫高窟第361窟的五台山图——莫高窟第361窟研究之二》,待刊。
- ㊹ 志磐:《佛祖统纪》卷四二,《大正藏》第49册,第379页,此事亦见于王溥《唐会要》卷九七,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734页。
- ㊺㊻ 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2、5266页,第3418页。
- ㊼㊽ 拔塞囊著,佟锦华、黄布凡译注:《〈拔协〉(增补本)译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第22页。
- ㊾ 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64页。

(作者单位 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

责任编辑 陈诗红